

汪德迈中国学研究的突破点

〔法〕金丝燕

1996年，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在南京共同举办“文化互识与共存”国际讨论会，提出创办中法“远近丛书”和《跨文化对话》辑刊的计划。第二年，汤一介、乐黛云两位先生来巴黎作学术交流。2000年，中法合作“远近丛书”和《跨文化对话》辑刊出版，辑刊主编选中了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汤先生说汪老是法国第一儒，要我协助向中国学界介绍汪德迈的研究思想。我们见面，汪先生笑言：“汤一介教授是中国第一儒，我只是研究儒学。”这样，我就跟随中国第一儒的汤一介和夫人乐黛云先生，走进了汪德迈先生与北大、北师大学术交往之中。

2015年8月，汪德迈的《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中译本完稿，我将之送交北京大学出版社^①。不久，汪德迈先生应国内西夏文专家、法兰西学院2013年儒莲奖获得者李范文先生的邀请，去敦煌看石窟。晚间散步，有石窟、沙漠和天际做伴。汪德迈先生说：“若上天继续给我光明，我将写一本小书《中国教给我们什么？》”^②。

《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生存方面》就是缘起于敦煌沙漠的蓝天之下。与《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的中译本稍有不同的是，前者的完稿与汉译有前有后，当然也有的同步进行。《中国教给我们什么？》的汉译与作者的法文著述写作则几乎

① 〔法〕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法〕金丝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② 〔法〕汪德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与生存方面》，〔法〕金丝燕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

同时进行。汪先生写一章，我翻译一章，他寄来一段，我翻译一段，补充新章节或改写某一段落的事，在我们之间经常会发生。中译本完成在法文书稿最后形成和出版之前。“这次先出中文版，后出法文版”，汪先生说。



图1 汪德迈先生



图2 《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书影

汪先生希望先出中译本，因此我得以在翻译中直接跟上作者的思考进程。两年之中，汪先生周日上午九点准时到法国巴黎索尔邦大学一侧的索尔邦广场书桌咖啡馆（L'écritoire），五年前的元旦，我家搬离维克多·古然街（rue Victor Cousin）寓所，书桌咖啡馆就成了我和汪先生周日工作的唯一公共场所了。无论风雨、节假日，四季从不间断，除非汪先生或我来中国。与我们同桌的还有一位忠实的伴者，在索尔邦一大哲学系读书的陈陶然。每个周日，她都从五区的单间公寓过来，向汪先生敬礼后，坐下，或画墨笔画，或临摹小楷董其昌的《金刚经》。字帖是画家江大海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寻访数次找到的，送给了陶陶。五年间，三人同桌，往来两个世界：艺术的、思辨的，我和汪先生讨论，

陶陶和她的绘画对话，咖啡是我们的共同见证者。

2017年出版的论著《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的中译本就是在书桌咖啡馆和我的古然街旧居完成的。该书集汪德迈毕生研究思想之大成。基于对中国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汪德迈认为，21世纪，中国可以以其悠久而丰富的思想与经验，为世界寻求新的社会模式提供参照。中国思想源于中国文字，中国文字的起源为占卜，占卜对中国思想模式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本书要点如下：

1. 作为科学原型的史前中国占卜技术所展开的思想，并非宗教性的神学，而是准科学性的占卜学。

2. 中国文字的创造出于龟卜兆纹的向外推衍法。

3. 文言文离自然语言相当远，十分系统规范化（六书的系统文字代替自然产生之词，卜辞类似数学的方程式句构，代替自然语言句构），体现另一种高度抽象性。

4. 西方文学起源于古典神话的口述（《伊利亚特》《奥德赛》），中国文学起源于占卜学者（史）用文言文记录原本与卜辞有关的各种资料。

5. 西洋思维完全不受印欧语言的语义系统限制，因其为字母文字，可以任意创造所需的观念，但容易陷入空虚观念的语言游戏，中国思维受文字系统限制，不创造文字以外的观念，不容易进行改革，可是有客观性的保证。

6. 中国传统科学（尤其医学）的特性乃相关性系统思维，西洋传统科学（尤其物理学）的特性乃因果关系性系统思维。

7. 中国是礼学传统，西方乃权理传统。

8. 西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现代性，而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其启蒙始于五四运动。

汪德迈在此书《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中，简要、深刻地从语言、社会与生存三个方面，阐述他的中国学研究观。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强调其中国学思路，是去发现属于世界文化共有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根基：“不要以为其特殊性比起普世的表面同相来并不重要，后者只

有毫无价值的一般性，比如，所有人‘用两脚走路’。”而写此书，就是要探究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里所遇到的一种普遍真实。

在语言学层面，汪德迈指出，中国语言最显著的特殊性是举世无双的文字，语言的交流功能和思辨功能的普遍双重性清晰显现。而这一普遍的双重性本来是所有语言的基础，在拼音文字里书写与口语的混合而不再显现。书中讨论六个要点：

1. 中国文字的出现，完全不是为了交流，而是要记录由专职官员所施行的占卜活动，占卜性准科学以《易》学闻名，中国的文字历史体现的是一种导致占卜学的思想，即思辨性的思想，它纠正言语，使之完善。这一改造在中国远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是因为自 19 世纪以降，中国文化吸收了西方思想形式，后者由书写口语的文字所承载。

2. 文言作为超越交流口语用途的文字而被构建成一种思辨的，即纯粹探究性的、超越实用性的思考工具。西方思想所发展的“话语学”（*logique* 逻辑），而中国思想则发展成“文字学”（*grammatique*）。

3. 在西方文化里，思辨性思想从话语后形成的拼音文字形式里提炼出交流性语言，以期从中提取概念性语言的精华。中国思辨性话语则完全不同，是通过隐喻，要在根本意上（不是在语法上，而是在话语的语言性“文”之含义上）去定义中国“文言”性思辨话语。中国的逻辑是一种“表意性”逻辑，完全以另一种方式使语言运行，而非亚里士多德的“话语”逻辑。

4. 字法^①与话语逻辑的根本分歧在于，逻辑依靠话语准确的语法秩序、通过词形变化来表述；而“文”的语法依靠的是文字的词义，它用形旁和声旁来表示，声旁同时带有语义。这一潜在的语义结构，使得起源于占卜兆纹的文字，成为带有揭示事物“形而上”含义的述行性文字。中国的思辨性是关联性的，而非假设—演绎的推理。

5. 公元前 13 到 15 世纪发展起来的中国表意文字，作为概念形式，

^① “Grammatique”即“字学”，汪德迈受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古汉文辞典》（*GrammataSerica Recensa*, Museum of Far EasternAntiquities, 1957, 1972）一书书名的启发。

属于思辨漫长发展的一个阶段。由此产生的笔画构字法，在中国还确保了科技直至近代的发展，“完全无须羡慕西方所有孕育于经院式逻辑的科技发展”。

6. 美学维度是中国文字的精髓，《文心雕龙》之于中国文法堪比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之于古希腊的逻辑学。表意文字的文学是最美的，刘勰对之有生动精到的妙言：“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中国思想家们用文学方式进行表述，中国文化不发展特殊的哲学体裁。

在社会组织层面，汪德迈不认同汉学界同行的唯物主义史学观，他认为，中国一切制度的起源与演变，都建立在中国特有的生产关系观念之上。在中国社会，是生产关系观念指导生产方式。他指出，唯物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生产方式主导生产关系是错误的。中国历史证明，中国人是根据思想进行社会性组织的。其要点有：

1. 依据礼仪形成生产关系。占卜理性在宇宙学的伸延中将古代中国引向礼仪化。

2. 通过使社会结构与宇宙结构相应，通过使社会的运行和四季阴阳运行一样和谐，让社会屈从于礼仪。

3. 国家官员而非领主负责督查土地的分配。领主与养活他的农民之间有专人做中间人，社会关系可以通过孟子的“仁”之精神得到缓和，而非是生硬的主奴关系。

4. 中国生产关系模式和希腊-罗马世界奴隶的模式，即被法律认可的由主人将奴隶作为货物买卖的模式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模式为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央帝国建立了政治社会双重架构，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土地农业官僚权力和知识分子的文官权力。

5. 公田共耕制被初税亩制取代（税，形声字，从禾，兑声，意为割取），农民体力劳动税制化在齐鲁广泛施行并遍及各诸侯国，农民劳动社会生产方式的物质化的后果是，国家士大夫阶层，即劳心者阶层，不再为自己国家服务，开始向其他强盛国推荐自己的才能，由此萌发

游士辅佐多国统治者的有偿服务之萌芽。

6. 在周代后半世，中国四分五裂，中国文人起着政治社会变革的驱动作用，起这种作用的不是农民，亦非被传统编年史置于首要地位的诸侯。

7. 孔子获得非凡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他在中国从古代文化到古典文化的过渡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独自一人突破原先由中央集权文化掌握占卜文字的局面，开启了这一过渡。孔子认为，自己有责任修正整个王权机制的书写传承，并大力冲破这一中央集权。

8. 地主阶层土地所有制与文人阶层意识形态权力所有制形成，废除井田制促使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名田”受长足发展的贸易商品化的推动，成为贸易对象。但源自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初始公田概念从未被“名田”的私有化所抹去，而农业社会生产商品化所导致的国家机器的弱化，又在行政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国家的强化得到很大的平衡。

9. 官员由科举制度产生，直到 1905 年科举都是中国推行的选官制度。一千三百年间，科举制度不断按儒家思想方式进行完善，不断强化文人阶层在皇朝体制中比皇权更为深入的作用，马克斯·韦伯以来，西方学者主观地将之混同于官僚制度，其实两者完全不同。韦伯们认为，官僚组织制度是通过具体事情、行政组织而进行的人类行政组织化。这是中国生产模式的商品化第一阶段导致法家制的倾向。但是，文人官僚制则完全相反，它将体制中儒家思想精华的力量发展到极致。

10. 罗马的财产所有制征服了世界，而中国则通过科举制广泛建学校。开始是中世纪在朝鲜、越南、日本，之后，现代时期在西方，从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开始，整个欧洲沿用这一考试制度选拔人才。

11. 中国古代社会所形成的机构体制与欧洲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相去甚远，而人们通常不完整地将西方有关词汇用于翻译中国社会形态，造成混淆。秦始皇时期的罪奴制度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生产关系机制完全不同。与中国社会同期的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晚于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相应的发展时期是封建制。我们现在来看与

之有着根本不同的欧洲封建制，而后者比前者要晚一千年。

12. 中国封建制建立在“宗法”上，以此强化中国封建权力，而欧洲的封建制建立在骑士即武士的价值上。在西方，封建性具有所有印欧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即杜泽梅尔在比较研究吠陀、古希腊和古罗马宗教后所指出的社会运作基本三功能性，神、武士和生产者三功能性。而中国古代社会建立在文人阶层的劳心者治人和农民劳力者双重基本关系上。

13. 中国文人官僚阶层和韦伯意义上的官僚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属于纯行政性运作体系，它完全脱离了行政功能。当选治国之才不再依据军事能力而是儒家思想道德价值。韦伯的官僚体系则相反，它追求一种纯运作性的官僚体系。

14. 科举制不是为了培养称职的官僚，相反，目的是录用真正的文人做文官。至于技术能力，它们并未被忽视，但只能通过实践得到。技术才能不是科举考试的门槛，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中国文学官僚机构是御史台，技术能力用来评判文官活动并作为文官升降的依据，这在西方的官僚制中不曾有过。

15. 大土地主阶层和文人阶层，两者形成中国帝国的社会基础。然而，文人阶层始终比大地主阶层优越，因为文人比农人优越；而正是这种知识拥有相对于物质财富拥有的优越感，使得中国历史上商品化不曾导向资本主义，尽管有商业、货币与技术 and 制作业的发展，清代的中国却毫不羡慕工业革命前的欧洲。

16. 明代以降，与西方资本主义决然不同的纯中国式的官僚与中国文人阶层的混合。今天，这一混合体换了一个方式存在。

在生存层面，作为儒学专家的汪德迈有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特有的占卜学维度取代了最初的宗教思考维度，人的普世意义是“天人合一”。儒家通过礼仪的实践，道家则通过人顺应万物的自然运行为目的的解脱行为来践行“天人合一”。水墨画更是生存与自然意念的诗化，源自纯中国宇宙学的世界观。

汪老首先从艺术着手论述。他认为，六朝出现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源自书法的水墨画，与工匠毫无关联，它是文人的创作。因此，文人画非常接近文学构思，和后者一样，它成为中国艺术理论家所谓之“写意”的另一种方式。这与希腊画家宙克西斯（Zeuxis，公元前404—前306）的艺术相反，宙克西斯画葡萄，逼真得鸟群来啄食。与此完全相反的是，王维（701—761）的瀑布，李昭道（675—758）或董其昌（1555—1636）的山峦，马远（1160—1225）山岩顶上凝视四周的隐士，表现诗化自然。西方画家和中国画家，有关艺术作品的看法完全不同。西方画家沉浸在圣经的创造观念之中，再加上柏拉图的神造观，亚里士多德改为自然乃创造者之观念。由此，西方画家学习以模仿自然进行创造，他坚信自己就是依照创造者上帝之像被创造出来的。而中国画家，完全没有创造的意念，他沉浸在与上天合一的意念里，作品中所表达的来自于内心深处所感受的万物之含义（写意），而非“写真”。

在西方，它被柏拉图客观理想主义的哲学理论化，成为真实的观念实体，后者建构超验的精神世界，而感性世界则只是前者的影子。柏拉图以此推断出“回忆说”。而中国的禅宗与老庄道家融合，将事物的空性与语言本在之虚假所反映的现实幻象之虚相连。

该书第九章讨论特殊的中国资本主义。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以其发展印迹清晰地显示出已经走出胚胎阶段；但中国资本主义与文人官僚相交而成，与西方资本主义决然不同。中国文人官僚在中国资本主义里引入一种导致自体免疫性疾病的轻商基因，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制约，乃至不能像19世纪控制西方体制那样控制中华帝国体制。中国旧资本主义的这一局限性并非像韦伯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儒、道的宗教特点不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清教徒伦理相兼容。余英时指出，19世纪中国儒商伦理与清教伦理很相似，中国所有的社会价值都导向文人官僚精英，儒商伦理在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主流。与中国旧式资本主义相比，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不带纯属古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自身免疫基因，因而不会通过文人官僚的优越性而自抑。



18
伽利洞涉水圖
設色紙本
六八×一三八厘米
二〇〇一年

夏坐已終雨猶凝，天公於客頗愚弄。平晴無際交遠風，兼
流截斷齊奔洞。地濕欺人脚陷泥，波翻退勢馬脫鞵。輻旋
應真力渡水，深颺淺揭情何重。山前紅碧紛奪目，林底龍
蛇招人襲。乍悟虛空山巖然，尚喜雷風心不動。窟中佛像
百丈高，氣象儼與天地共。參禪精意解教機，聞道痴人強
說夢。江花微含春山笑，歸路又勞秋葉送。身外西鄰即彼
岸，情處東風初解凍。可有言泉天半落，頓覺慧日雲間
湧。老聃舊曾化胡來，遺察何必傷鱗鳳。
冒雨遊伽利洞，汪德邁背余涉水數重，笑謂同登彼岸。辛
巳，蓮堂德邁。
寫生地區：印度

图3 青年时代汪德迈背饶宗颐涉水过印度佛陀开悟圣地纪念（《饶宗颐教授艺术创作汇集》之《寰宇风光》册，第18页《伽利洞涉水图》）

该书第十章讨论中国文化中宗教意识的隐去。汪德迈指出，中国与西方思想受语言影响，发展方向完全不同。西方的拼音文字收集了从地中海区域的巴比伦、腓尼基、犹太到古希腊传播的神话大叙述，从中产生圣经的和希腊式的理性神学。中国则相反，神话不在占卜学所用的“文”之列，阴阳五行的宇宙学取代神话学。神话的历史化与周代体制抹除殷代奉行的宗教化祭祀的努力相应。汪德迈认为，周代抹杀殷代的历史，用神话取代历史，周代借助伏羲的神秘面目抹去《易》与殷代占卜相连的所有痕迹。而历代中国历史学家对此沉默不语。

中国儒家礼制是用社会意识完全抹去宗教意识，汉语“宗教”是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论著时体现西方含义的词语。汪德迈认为，中国的教理性宗教观公元6世纪才出现，佛教此时进入南方文人阶层，使非礼仪意义上的纯宗教意识开始活跃。中国对宗教行为的理解，与西方的教义性虔修绝然不同，中国宗教观的特点是与上天崇拜决裂，周代的礼制显示的就是这一断裂。中国宗教被设定是精神教育的部分而非为上帝意志服务的修行，前者保存了神异性，并使中国避开了宗教战争之祸。历史上的禁佛就是这一对宗教不宽容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这一意识形态上的不宽容在中国形成传统。但是和西方所经历的宗教不宽容完全不同。另一个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式的超验性含义。西方思想将超越作为思辨的对象，它的性质是超越人通过自身的能力具有的认知。神学解决了这一矛盾，把上帝作为超验的三位一体，所造之人自然是有灵魂的，其理性官能天生具有超验感。中国思想中展开的是另一种超验观，即超越感知形体，用“形而上”一语表述。中国占卜文化通过占卜学而非神学来拓展启示性。西方超验性本体的“当下”物质世界与“上天”的非物质世界之间是决裂的，中国的超验性有着同质而断裂的特性，现象层面的“形而下”和超感知现象的“形而上”共在。“形而上”在理性层面透过表征解释现象，形成宇宙学，代表内在性超越。内在性超越的概念使道德法则的宇宙化进入儒家思想。

宇宙道德化体现在中国语言的形而上特质上，以《庄子》的譬喻为代表。它与神话无关，神话制造任意想象的诠释，出于对远古的无知。而《庄子》的譬喻创造含义，将语言无法直接概念化的能指符号用来解释比喻性的所指。在这一意义上，汪德迈认为《庄子》超越了《道德经》，后者尚未从神话思想中完全解脱出来。庄子通过譬喻，也与儒家所倡导的“文”分道扬镳。

因此，汪德迈认为，柏拉图式的超验性是另一个世界的，洞穴之外的，而道家的超验性是在内在性里，一如蛇在蛇皮里，知了在蝉蛹里那样。柏拉图思想最终导致康德的先验性哲学批评，而庄子的道家思想则导向佛教禅宗的超验性。《庄子》从形而上的角度思考事物形

而下层面的无区别。汪德迈指出：“佛教以更绝对，更本体论的方式指出存在与非存在之间无区别，这就是禅宗超现实、超越普通语义的话语——重拾《庄子》的神秘话语——所展现的。”

汪德迈在该书结论部分提出：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其基础是文人官僚与地主官僚的传统。这是西方不可能学到的。而中国的“天人合一”理论更吸引西方。它建立在《易经》占卜性宇宙学之上尤其是中国的表意文字。它不仅影响了认知世界的所有领域里的思想，而且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成为特殊符号学的对象。《庄子》揭示语言本有的虚假性。而西方思想受拼音文字左右，将话语的魔力推向极致。

汪德迈的学术思想具有跨文化视野，其研究有四个突破点。

首先是从中国文字的起源出发研究中国思想。^①汪德迈指出，中国文字的占卜性起源是准科学的、高度抽象化的过程，它决定了中国思想的关联性特点。汪德迈认为，中国儒家经典与《圣经》一样具有神圣性。但《圣经》的神圣性在于它是被上帝启示的文字，而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在于它是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启示性，即以书写语言（文言）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儒家注疏把文本本义与文字结合，解读“微言大义”。《圣经》阐释学则相反，将本质含义与表面文字分开，使文本的语义发生裂变，以使文字背后的含义显露出来。正是文字本体性质的诠释使命使中国史官对文字记载极为重视，即“正名”的原则，甚至不惜为之捐躯。在文学写作上，西方文学与注重上帝意志的《圣经》一样，文本首先体现的是创作者的意志。作品的价值与其个性化程度成正比。在中国的作家文学中，如同注重文字本体诠释的儒家经典一样，作者为了释放书写本身^②的力量把个性化放在第二位，即使是最抒情的作品也采用无人称的形式。

① 参见汪德迈：《启示性文字与被启示的文字——与《圣经》阐释学相对立的儒家注疏》，《跨文化对话》第22辑，“方法论研究专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5页。

② 参见汪德迈：《从文字的创造到易经系统的形成：中国原始文化特有的占卜学》，《跨文化对话》第28辑，“方法论研究专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83—192页。

汪德迈中国学的第二个突破点是关于汉字精神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他指出汉字精神是占卜性。他认为中西文化、思想的不同，不仅仅是表意文字与字母文字相去甚远，而在于起源的不同。中国思想最初以一种极为讲究的占卜方形式为导向，希腊-拉丁并犹太-基督教一方，思想最初以宗教信仰为导向。

汪德迈先生借用安德烈·马蒂耐（André Martinet）的观点，普通语言是两层意义的组合。第一层是话语流上形成的意义单位，第二层是以这些意义单位为基础所形成的语音符号单位。而中国文字起源为独一无二的“文”言形式，是一种创自武丁统治（公元前1250—前1192）时期的书写符号体系，其目的并非像所有其他文字——无论表意或拼音文字系统——那样去记录口语所言，而是用一种科学语言形式去记录占卜运行规则。占卜学不是去挖掘自然与被认定是操纵自然的超自然之间的契合，而是理性地研究自然现象之间的契合。它从卜相之间的关联入手，借结构性形态-逻辑之光，就现象本身之间的类式继续推进已经出现的思辨。中国思想里有着占卜语义性的深刻烙印。它对自然语言的语义性进行了彻底地重新组合。占卜师造出的占卜性语义更是彻底弃绝了自然语言的语义。因此，中国文字是有别于其他表意文字的特殊文字，举世无双。汪德迈的结论是，中国的哲学思辨中的占卜学遗传因子一直存在。西方思想从神学思辨起点发展，而中国思想则是从占卜学思辨出发，中国传统的《易经》，正如西方传统的《圣经》，同样极大地影响整个思想史。

汪德迈中国学的第三个突破点是“异托邦”方法论。《跨文化对话》2009年第23期“方法论研究专栏”刊登汪德迈的文章《我之汉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①，集中阐述了他的中国学方法论。他写道：“就我而言，我越是想理解中国思想的精髓，因其特色总是让我着迷，我越是为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备感惊讶。但是我并不从道教这条在

^① 参见汪德迈：《我之汉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张新木译，《跨文化对话》第23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214页。

线，而是从另一条在线努力寻找中西文化分歧的原因：即儒教的在线。道教的宗旨是通过摆脱所有对社会的介入而实现真人的理想，而儒家则相反，儒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秩序。”

他提出的问题是，分歧从哪里开始，使得中国文化朝着礼治方向演变，而西方文化朝着法治方向发展？这是两种对行为进行规范的不同机制：中国是礼仪机制，而西方是法律机制。在他看来，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分歧在于神学理性和占卜理性。前者是西方思想的杠杆，后者是中国文化的杠杆，是宇宙学。

汪德迈始终抓住中西的相异性作为研究视野，他借用福柯的术语“异托邦”概括他的汉学研究方法。认为研究不同文化的相同性，比较容易落入假问题框架。而相异性是研究者应该努力发掘的。

汪德迈中国学的第四个突破点是提出中国思想的形而上，即宇宙形而上的观点。2016年9月在北大纪念汤一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讨论会上，汪德迈发言，其论文题目是《‘形而上’与‘物而上’两个概念，两种世界观》。他从最初出现于《易经·系辞》第十二章“形而上”概念入手，指出超越“形”者，与“形而下”相对。西方的“*métaphysique*”被译成“形而上”是很糟糕的，它导致对中国的超验性产生严重的曲解。该术语应该是“物理之外”、“物而上”之意，指超越万物之本体。宇宙学源自将宇宙变化范式化的占卜学，阴阳五行内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这一规律属于某种超越，属于占卜学的维度。它的运作，不在现实之外，而只是在我们所感知的维度之外，那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在史前中国的祭祀里，万物灵性的威力被诠释为宇宙至高无上的超自然，用“上”指宇宙之“帝”，以区别帝王之“帝”，非地面的君王。汪德迈认为，将“上帝”之词认作拟人化，是传教士们造成的一个误解。

亚里士多德的“*métaphysique*”作为物理基础的研究，是通过推理而非占卜进行的。推理针对物理现象的诠释关键点，即研究其因果性。整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是其四因论（动因、质料因、形式因与目的因），而“*métaphysique*”是对终极因的研究，通过终极因得以解释

物理因果性。充溢创世概念以及神的概念，神人同形，源自人类因果性模式，是一种无限中通往有限的“超越-形式”。因此，亚里士多德物而上之路是一条应用于物理基础研究的逻辑之路。

汪德迈指出，中国思想没有像希腊思想那样从事物的规则里提炼出范例和因果性，而是从占卜象形结构（卜兆、蓍占）提炼出关联性规则。与因果性不同，关联性在互相感应层面运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的“德”指每一个人的本性均含来自宇宙的灵魂力量。而《易经》从知的角度重灵性的力量。“德”超自然。整个中国的“知”之哲学就在直觉“明德”的概念之上。



图4 本文作者与汪德迈（右）在工作中

2018年11月中，本书的中译稿完成，寄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她回复：“文稿收到，简明深邃，写一个作者简介，不是维基语言风格的。”

一个周日的上午，“书桌”咖啡馆，汪先生说：“我为书和写作活着。我九十一岁了。以前我的老师饶宗颐告诉我，他‘写书，到九十封笔’。我呢，还在继续。”